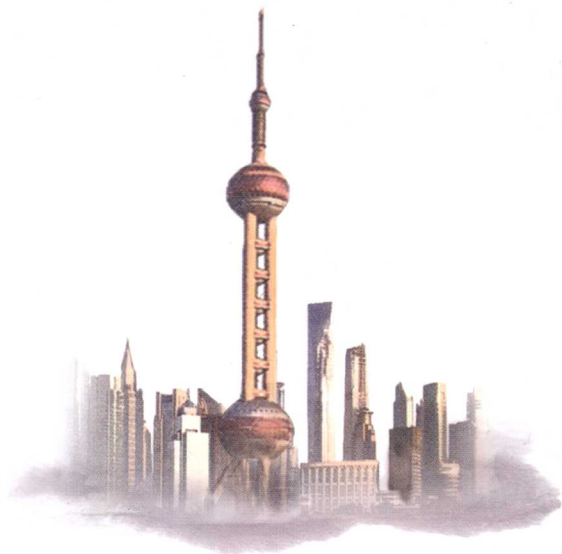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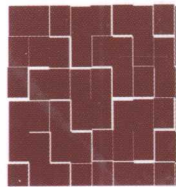


高储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典型特征，我国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国民储蓄率超过了合理水平。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关键问题之一。

本书从结构视角分析得出，“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不断增长带来了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增长，“企业储蓄”是我国国民储蓄率高的关键原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宏观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国民储蓄调节功能，实行适度的“结构性赤字财政政策”；进行税制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Savings in China

彭志远 康丕菊◎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 013051947

F832.22

24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

彭志远 康丕菊◎著



北航

C1659871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F832.22
2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 / 彭志远, 康丕菊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141 - 3124 - 6

I. ①我… II. ①彭…②康… III. ①储蓄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3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400 号

责任编辑: 齐伟娜

责任校对: 刘 昕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李 鹏

我国国民储蓄研究

彭志远 康丕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1.25 印张 200000 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124 - 6 定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扩大消费”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研究的重大问题，彭志远、康丕菊同志的这本专著，研究了我国国民储蓄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再次回答了“我国国民储蓄是否过度”、“国民储蓄构成的各部分的数量、变化趋势”、“国民储蓄的调节”等问题，为我国“扩大消费”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具有理论和政策意义。总体上看，这部专著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论证翔实、结论鲜明、表述科学、规范，具有较多创新地方。

一是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动态效率”各种主流理论模型，说明了“储蓄率”内生模型关于“动态效率”的分析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根据我国宏观经济现实，企业储蓄高，企业储蓄中“国有企业”又占有相当比重，这样，储蓄率外生的 Solow-Swan 模型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动态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运用了经典的两种方法“资本收益率”及“资本产出弹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的结论。

二是关于我国国民储蓄实证研究，分析了普遍采用的“资金流量表”的严重缺陷，提出运用支出法 GDP 核算数据来测算“企业储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的科学性；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的边界则不完全清晰，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了本书中测算的“居民储蓄”是指普通居民的储蓄，占居民比例非常低、以少数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高收入群体的储蓄更主要体现在企业储蓄之中；在方法上提出了两种观察国民储蓄率变化趋势的方法，按照统计学分析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幅度小于按照宏观经济“均衡分析”的数据，标准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很难将 2002 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的“高增长”、“低通胀”考虑进模型之中，鉴于此，得出“1994 年以后，国民储蓄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均呈上升趋势”的结论。

三是关于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对策研究：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突破了宏观调控中“短期总量调控”的缺陷，提出了运用“结构性赤字”财

政政策来调节国民储蓄与“扩大消费”，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了稳健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从债务风险防范角度提出了保持2%~3%的基本赤字率是可行的；关于扩大居民消费，对城镇居民而言，从“住户调查”分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居民家庭现期收入增长是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扩大居民消费”除运用传统的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为重点的方法外，还要从“税制”改革来“扩大居民消费”；针对农村居民，将一些传统研究没有考虑的“实物储蓄”、“货币幻觉”等因素纳入农户消费行为分析之中；关于宏观收入分配体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农产业”劳动者报酬比重存在大幅度下降，提出了“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为重点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提高。

当然，关于国民储蓄还有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理论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古典经济学“消费不足”相关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对比研究还需要深入，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可以进一步完善西方主流理论的缺陷；二是一些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例如关于居民“追求财富”的储蓄行为还需更多的实证研究，希望就这些问题继续深入研究。

洪远朋

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与此对应的是“高储蓄—高投资”现象,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小于投资、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消费在总产出比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投资与净出口拉动型,当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突破了50%。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关键是要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提高消费占产出的比重,“扩大消费”已经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核算上看,国民产出中消费的剩余部分就是储蓄,本书拟对“国民储蓄”进行研究,探讨“扩大消费”的政策,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研究了“合理国民储蓄”的标准,重点运用主流经济学“动态效率”理论来研究,得出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的结论;此外,还结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超过了“合理”水平。

第二部分从结构视角分析了我国国民储蓄中的“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数量(占GNP比重)及变化趋势,当前“企业储蓄”是我国国民储蓄高的关键原因,我国国民储蓄的变化趋势主要应该由“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来解释,而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储蓄”总体上保持了稳定。通常研究中“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的边界一直没有很好区分,本研究所采用的测算方法得到的“居民储蓄”主要是指“普通居民”的储蓄,占居民比例非常低的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少数高收入家庭的储蓄更主要体现在“企业储蓄”之中。

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扩大消费”的对策研究。

一是从财政政策角度提出实行“结构性赤字”财政政策来扩大消费,我国宏观财政政策不能仅限于“短期调控”,更要发挥“结构调整”功能;我国中长期只能实行“稳健(中性)财政政策”,笔者从理论上分析了“稳健财政政策”与“结构性赤字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冲突,关键是使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保持“潜在增长速度”,从债务风险防范角度提出了保持2%~3%的基本赤字率是可行的。为消除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疑虑,我们在长期分析框架下对“挤

出效应”的类型进行了研究，政府消费并没有挤出居民消费，扩大政府消费支出可以达到调节国民储蓄、扩大消费的效果。

二是针对居民消费，本书从“居民消费倾向”角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城镇居民而言，占人口多数的普通居民家庭现期收入增长是消费倾向下降的直接原因，“预防性储蓄”并不能完全说明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农村居民而言，在当前实物储蓄对农民的储蓄有着明显的影响，现金意义上的当期名义收入对当期消费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中国农户存在明显的“货币幻觉”现象。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我们应该以“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为重点进行税制改革，相应刺激城镇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要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使得农民能够尽量将“实物储蓄”转换成现金收入，鉴于中国农户存在显著的“货币幻觉”现象，因此，从宏观经济上看，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扩大农户消费，货币政策要避免“通货紧缩”。

三是本书结合产业结构演进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报酬”进行了实证分析，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成为我国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关键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下降更为显著，“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提供了关键条件，最后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重点的税收制度改革建议，以此真正实现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

目 录

导 论 / 1

第1章 “扩大消费”研究框架比较 / 3

- 1.1 “扩大消费”研究评述 / 3
- 1.2 宏观消费率变化分析 / 6
- 1.3 “扩大消费”：“国民储蓄”的研究视角 / 11

第2章 国民储蓄率的相关理论评述 / 16

- 2.1 “合理国民储蓄率”的理论演进分析 / 16
- 2.2 动态效率理论分析 / 22
- 2.3 宏观经济动态效率研究现状综述 / 34

第3章 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问题： 基于经济动态效率的实证分析 / 39

- 3.1 “资本收益率”与我国宏观经济动态效率 / 39
- 3.2 “资本产出弹性”与我国宏观经济动态效率 / 48

第4章 合理国民储蓄率的标准问题：基于现实分析 / 56

- 4.1 “经济潜在增长率”与我国国民储蓄率 / 56
- 4.2 高储蓄与生产过剩 / 60

第5章 我国国民储蓄实证研究 / 66

- 5.1 国民储蓄与宏观收入分配测算 / 66

5.2 “国民储蓄率”变化的统计分析 / 75

第6章 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之一：宏观财政政策研究 / 81

6.1 关于对策研究的说明 / 81

6.2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评析：宏观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吗 / 84

6.3 国民储蓄的调节与“结构性赤字”财政政策 / 89

6.4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再论挤出效应 / 92

6.5 稳健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 / 101

6.6 现阶段我国合理赤字率的分析 / 111

**第7章 国民储蓄调节与扩大消费之二：
居民消费倾向与扩大居民消费研究 / 119**

7.1 相关理论及文献评述 / 119

7.2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研究 / 123

7.3 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析 / 130

7.4 结论及政策意义 / 138

**第8章 国民储蓄的调节与扩大消费之三：
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与扩大消费研究 / 140**

8.1 关于“提高两个比重”的说明及相关文献 / 140

8.2 “劳动者报酬比重”的实证分析 / 142

8.3 “刘易斯拐点”与工资增长 / 150

8.4 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对策 / 155

参考文献 / 159

后 记 / 170

导 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与高增长对应的是“高储蓄—高投资”现象,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小于投资、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消费的贡献,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自1985年以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978~2008年我国消费率从62.1%下降到48.6%,相应的“国民储蓄占GDP比重已经突破了50%,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投资与净出口拉动型。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总体上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从制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的各项“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看,在于中国的“高储蓄”带来的资本快速积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增加储蓄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我国现实看,高储蓄的确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一直到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显著的“需求不足”之前,我们并没有过多讨论“高储蓄”可能带来的问题,1998年之后,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国民储蓄率进一步攀升,才使得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国的国民储蓄是否太多?是否需要进行宏观调控?从经济现实看,近年来宏观经济越来越明显暴露出如下问题。

一是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内需不足”风险。“内需不足”在1998年之前并未受到关注,但自从1998年首次出现通货紧缩以来,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逐渐受到理论和决策的重点关注。1998年后我国连续实行多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宏观经济直到2003年才基本走出通货紧缩;2005年后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2005~2007年宏观经济总体上平稳运行,总体并没出现明显过热,但2008年,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下滑压力,再次暴露出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又转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述宏观经济运行现实给我们一个提示:我国从1998年以来出现的“过剩”压力并不能完全运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过剩”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困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顽症”。显然,

经济增长的自然逻辑是：

产出→消费+储蓄→投资+净出口→产能增加→更多产出

因此，高投资带来的是越来越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大的消费、投资、净出口来消化，这样，“产能过剩”就很难避免。

二是如果相对于 GDP，消费增长较慢，即国民经济储蓄比重越来越高，投资很难吸收大量的储蓄，这样，净出口在 GDP 中的比重就会上升，这正是我国 2003 年以来的情况。2003 年之前，净出口占 GDP 比重稳定在 2%~3%，2005~2008 年已经上升到 8%~9%，国际收支大规模持续盈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失衡，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同时大规模的净出口增长更不具有可持续性。此外，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多依赖于投资与净出口拉动，增大了经济增长波动的风险，因为在“三驾马车”中，相对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更具有易变性，事实上，如果净出口比重不高，2008 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可能相对更小。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表明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最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均有提及：2006 年提出“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2007 年提出“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2008 年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009 年提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0 年又提出“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2011 年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是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即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关键是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

这样，调整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占 GDP 的比重就成为宏观经济一个关键问题，显然，消费与储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微观意义上的家庭看，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剩余的就是储蓄，从国民经济整体看，产出扣除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剩余的就是国民储蓄，因此“扩大消费”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降低储蓄。不仅如此，整体经济中的储蓄不仅包括居民储蓄，还包括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因此，研究“扩大消费”问题，可以从消费和储蓄两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数从“消费”角度进行，选择“国民储蓄”进行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消费”的认识，弥补“扩大消费”研究的不足。

第1章 “扩大消费”研究框架比较

1.1 “扩大消费”研究评述

1.1.1 消费、储蓄、投资的因果关系分析

近些年随着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提出，这一问题便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从中长期看，“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目前“消费不足”的原因方面还存在较多分歧，参见方福前（2009）、刘惯超（2010）等的综述，这里就其中的关键问题做一评述。

到底是“高投资引起了低消费”还是“低消费引起了高投资”？刘国光（2002）认为，我国消费率偏低并趋降势，是与投资率偏高并上升有关，因此提高消费率要从调整消费与投资关系着手。张军（2010）认为，消费率是由经济增长和投资内生决定的。罗云毅（2004）认为，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全社会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是由居民部门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引起的。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

鉴于消费、投资、储蓄等概念往往交织在一起，为了研究的需要，首先需要从逻辑上理清它们的关系。关于上述问题：到底是消费决定投资率、还是投资决定消费？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总产出形成居民总收入，消费决策与储蓄决策完全是一回事，产出扣除消费便是储蓄，居民做出的关于消费、储蓄的决策决定了投资的上限，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平衡通过利率变化来实现，显然，投资率的大小是由消费率或者储蓄率决定。

另一方面，投资决定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我国的确存在，这使得投资决定消费也有一定道理。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虽然实行了“拨改贷”，但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原因，国家、银行、企业实际上是一体，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投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

GDP 政绩目标的引导下,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往往追求高投资的增长速度,形成超过储蓄总量的投资,这样,投资膨胀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经济过热”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国有经济的高投资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高投资可能引起了低消费。

上述分析是假定了两部分分析框架,在一个包括政府的三部门经济中,一种典型情况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如果持续提高且用于了投资,则发生了政府支出挤出消费。我国税收连续多年超过 GDP 增速,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如果将预算外收入、政府基金、国债等因素考虑进去,政府总收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了投资支出,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1998 年以来我国大规模发行国债,但国债的主要用途是“投资”,这才能说明我国政府“重积累、轻消费”的支出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投资决定消费也在一定程度存在。综上所述,我们不能简单说消费决定投资或者相反,关键取决于对现实的实证分析。

即使考虑“净出口”,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因为储蓄的吸收除“投资”外,就是“净出口”,这样,总体上看,“低消费”或者“高储蓄”是我国“高投资”、“高净出口”的原因,因此,“扩大消费”研究应该将“低消费”或者“高储蓄”作为逻辑起点。

1.1.2 “居民消费不足”相关争论

“居民消费不足”在我国“扩大消费”研究中占有绝大多数篇幅,从理论上讲,这一问题有两种研究角度。一是微观角度。分析“典型的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均有显著的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倾向显著低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水平,“预防性储蓄”、“基尼系数扩大”等因素制约了居民消费(见第 7 章的综述)。二是宏观角度,如收入分配、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近年来,宏观角度研究相对较多:安体富、蒋震(2009)认为,“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所占比重,着力拉动居民消费需求”;方福前(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是关键原因;刘生龙、周绍杰(2011)用“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不断攀升的行政管理费用”、“住房制度改革”进行了解释;赵坚毅、徐丽艳、戴李元(2011)认为,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另一些学者强调二元经济结构因素带来的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金三林(2009)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的

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又使得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增速,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进而导致总消费率的下降。陈彦斌、陈军(2009)认为,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拉低消费需求。曾国安、胡晶晶(2008)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阻碍了总消费需求的增长。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强调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制约,杨天宇、侯玘松(2009)认为,即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数百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高连水、邓路(2009)认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与居民消费率低迷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并构成了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格兰杰原因。白暴力、傅辉煌(2011)认为,收入差距偏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宏观效应——总消费需求不足。

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是相互补充的,但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1)一般认为,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是我国消费不足的关键原因,但居民收入的概念十分模糊,例如,私营企业主将利润留在企业,怎样计算其收入?(2)“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被多数研究认为是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但能否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宏观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存在如下问题:如果将农户收入定位在第一产业带来的收入,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背后是其劳动生产率也十分低下,创造的GDP也相对较少,因此很难说这就一定导致宏观消费率的下降。按照我国现行的统计方法,农户收入还包括工资性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相对于GDP,农户收入增长缓慢反映的是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已经不是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因此农户收入增长缓慢带来消费不足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3)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引起了消费不足,与人们的“直觉”吻合,在假定各个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是成立的,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存在一定差距,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一种典型情况是“低收入群体”在收入中的比重增大,而“高收入群体”相对减小,显然可以增加“消费率”,其政策意义是政府对“高收入居民”征税转移给“低收入居民”可以增加消费,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可以“扩大消费”。但从动态角度看,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后是否带来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还取决于各个群体消费倾向的相对变化(第7章将进行分析)。从我国情况看,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事实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据可能远远低于真实数据),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因此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可以“扩大消费”,但我国居民总体消费倾向下降显然不是仅仅依靠“收入分配差距”就可以说明的,以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为例,居民分为七个组别,随着时间发展(以改革开

放以来数据), 其中仅有占总户数 20% 的“最低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两个组的居民消费倾向没有显著变化, 而占 80% 的住户随着收入增长消费倾向显著下降, 这说明即使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没有任何变化, 从长期看, 消费倾向的下降也是必然的。因此, 关于收入分配差距与“扩大消费”仍有较多问题需要探讨。

1.2 宏观消费率变化分析

1.2.1 “宏观消费率”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扩大消费”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宏观消费率”的影响因素, 以此说明我们的研究框架。从理论上看, “宏观消费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居民与政府因素

我们将对外因素忽略^①, 在一个三部门经济中, 总产出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从收入方看, 分解为居民收入 Y_H , 企业收入 Y_E , 政府的净收入 T (总收入扣除转移支付)。从使用方看, 表现在居民消费 C_H , 企业投资 I_E , 政府消费 G_c , 政府投资 G_I , 有如下等式:

$$Y_H + Y_E + T = Y = C_H + I_E + G_c + G_I$$

显然: 宏观消费率 $c = \frac{C_H}{Y} + \frac{G_c}{Y} = \text{居民消费率} + \text{政府消费率}$

假定居民消费倾向为 γ , 显然 $C_H = Y_H \gamma$, 即:

$$c = \gamma \frac{Y_H}{Y} + \frac{G_c}{Y} \quad (1.1)$$

显然, 居民消费率与政府消费率决定了宏观消费率, 根据式 (1.1), 居民消费率取决于“平均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分配占 GDP 的比重 (宏观收入分配)”, 政府支出 (购买支出) 中也可以分为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 这样政府支出中消费占 GDP 的比重越高, 宏观消费率越高。

① 平均消费倾向与宏观收入分配问题参考了许永兵 (2005) 的分析。

2. 城乡二元结构因素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身带来消费需求不足”,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

为了说明问题的本质:假定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且没有人口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分为农村与城镇两个部分,农村创造的GDP为 Y_1 ,城镇创造的GDP为 Y_2 ,假定农民消费倾向为 α ,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 β (如下同),假定城乡不平衡发展,农村经济增长速度为 p ,城镇经济增长速度为 q ,则初期的消费率的计算公式为:

$$\frac{\alpha Y_1 + \beta Y_2}{Y_1 + Y_2} \quad (1.2)$$

当发生经济增长以后,次年的消费率为:

$$\frac{\alpha Y_1(1+p) + \beta Y_2(1+q)}{Y_1(1+p) + Y_2(1+q)} \quad (1.3)$$

根据式(1.2)、式(1.3),则消费率的变化为(当年减去基年):

$$\frac{Y_1 Y_2 (q-p)(\beta-\alpha)}{(Y_1 + Y_2)[Y_1(1+p) + Y_2(1+q)]} \quad (1.4)$$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城乡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并不必然带来消费率的变化,当城镇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农村经济增长速度时,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大于农村居民,此时,随着经济增长,消费率提高;(2)当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小于农村居民,此时,随着经济增长,消费率降低;如果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相等,此时,城乡的不平衡发展并不会带来消费率的变化;(3)根据式(1.4),由于 $(q-p)(\beta-\alpha)$ 总体上接近于0,因此这一因素对消费率的影响很小。

在现实中,还有如下重要因素影响该问题的结论:(1)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创造的GDP形成的收入均不能完全分配给居民,城镇多数居民获得收入的主渠道是“劳动者报酬”,事实上城镇居民“劳动者报酬”占城镇GDP比重非常低(第8章将定量分析),而农村居民相对较高,因此,根据“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得出“农村居民消费不足”仅仅是根据“收入决定消费”这一逻辑,这并没有错误,但我们当前讨论的“消费不足”主要是研究“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能简单得出上述结论;(2)从我国农村居民的

实际看,大量的“农民工”在城镇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仍统计为“农民纯收入”,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但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得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带来消费不足”的结论。

3. 城镇化因素

在“扩大消费”的研究中,有一种常见的观点是“通过城镇化”扩大“消费需求”,我们做如下假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位典型的农业劳动力创造的GDP为 y_r (边际生产力),其创造的GDP完全形成他的收入,该劳动力转移成为城镇居民,其边际生产力为 y_u ,当前的总消费为 C ,总收入为 Y ,则当前的消费率为 $CR_0 = \frac{C}{Y}$,当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且变为城镇居民,则:

$$CR_1 = \frac{C - y_r \times \alpha + y_u \times \beta}{Y - y_r + y_u} \quad (1.5)$$

显然,消费率的变化取决于 CR_0 与 CR_1 的相对大小,我们并不能得出“城镇化提高消费率”的结论。假定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且劳动力转移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状态,即劳动力转移初期,由于有“无限剩余劳动力”,假定农村居民边际生产力为0,农村居民的消费由“生存工资”决定,为一个不变的常数 c^* ,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的消费为一个不变的常数 c^{**} ,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

$$CR_1 = \frac{C - c^* + c^{**}}{Y + y_u} \quad (1.6)$$

$$\text{根据式(1.6),显然: } \Delta CR = \frac{c^{**} - c^* - \beta y_u}{Y + y_u} \quad (1.7)$$

一般来说, c^* 与 c^{**} 差距非常小,在“刘易斯模型”中,二者由“不变制度工资”决定,有 $\Delta CR < 0$,因此,既定劳动力转移符合“刘易斯模型”,劳动力转移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这实质上是我国宏观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见第8章的分析)。

4. 经济形势因素

经济周期中的繁荣与萧条往往也会影响总体消费率,与消费比较,投资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因此,从统计上看,在经济繁荣时期,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率